

维新时期地方学会、学校与报刊阅读的 拓展：以湖南为中心

蒋建国¹

【摘要】维新时期，《时务报》执新思潮传播之牛耳，各地维新报刊群起而响应。而地方社会学会、学校与报刊之间的互动互进，对维新思潮的地域化传播起着重要作用。尤其是湖南的南学会创办报刊、开办讲会、倡导维新，推动了学会、学堂与报刊的一体化发展。而《湘报》《湘学报》等地方报刊的广泛阅读，促进了维新思潮的“在地化”发展，对湖南地方“意义之网”与社会风气有着深刻的影响。

【关键词】维新 湖南 学会 书院 报刊

列斐伏尔(Henri Lefebvre)指出：如果未曾生产一个合适的空间，那么“改变生活方式”“改变社会”等都是空话^[1]。这也就是说，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思想文化都需要“在地化”，没有“地方”，就没有思想生成的基础。而地方具有物质、功能和意义三重属性，其中地方意义包含象征意义、思想感受和行为价值等等，地方具有特殊的身份和特性^[2]。“地方空间”是社会组织和个人具体的“所在”。正如卡斯特(Manuel Castells)所言，事实上，绝大多数的人，不论是在先进或传统社会都生活在地方里，并且感知他们的空间是以地方为基础的空间。地方乃是一个其形式、功能和意义都自我包容于物理临近性之界线内的地域(locale)^[3]。从这个层面上看，探讨维新时期的社会思潮，就不仅仅以《时务报》为中心来分析其在全国的影响，而应从“地方”的角度，进一步研究各地的维新派如何因应新思潮而进行“集体表达”，并如何促进学会、学堂、报刊传媒的一体化发展，使维新思潮与“地方性知识”有机结合，引发士林的广泛阅读和关注，从而促进维新变法活动的“在地化”，建构地方文化的“意义之网”。因此，“地方”是个体、社群与社会建立联系的纽带。“这种地方性不仅指地方、阶级与各种问题而言，并且指情调而言——事情发生的经过自有地方特性并与当地人对事物之想像能力相联系。”^[4]从这个角度看，探究全国各地尤其是湖南的维新活动，既需要以“他者”的眼光进行“深描”，又必须结合地方学会、学校与报刊阅读的具体情境，探讨维新思潮在地方社会的传播与影响。

一、维新时期地方报刊、学会与学校的一体式发展

维新时期，《时务报》不仅引领舆论、推动社会变革，它还作为当时新式报刊的坐标，为中国报刊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。在《时务报》的影响下，杭州、天津、澳门、广州、长沙、重庆、南昌、武昌、桂林等地相继创办了一系列维新报刊，如《国闻报》《知新报》《蒙学报》《农学报》《湘学报》《集成报》《博闻报》《岭学报》等等，这些报刊或受到汪康年、梁启超之启发，或得到《时务报》馆的支持与帮助。而《时务报》的传播模式又随其散布被地方中下层的开明人士所仿效，流传全国，成为分散各地的士人表达思想、发挥影响力的新工具^[5]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从1895年至1898年，全国出版发行的中文报刊有120种左右，其中约80%是中国人自办的。以资产阶级维新派以及有它联系的力量创办的报刊，数量最多，影响最大^[6]。这些新式报刊以推动维新运动为己任，以各种学会和团体为依托，以新式知识分子为中坚，推动报刊、学会与学校三位一体的全面发展，而报馆则在其中起着引领社会思潮的基础性作用。宋恕在《〈自强报〉公启》中说：“今天下竟言自强矣，自强之源在学校、议院、报馆，夫学校、议院，权不在士，报馆则是兴有责焉。”^[7]宋恕认为开报馆是“士人”可以较为主动和便捷的“自强途径”，梁启超也认为，学会固然重要，但是“其数甚微”。因此，“度欲开会，非有报馆不可。报纸之议论，既渍于人心，则风气之成或不远矣”^[8]。而报馆与学校之间则互为表里，相互依托，在促进文化传承与民族复兴方面均不可或缺。《国闻报》的一篇时评对二者之间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：

¹作者简介：蒋建国，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，博士生导师(广东广州510006)

基金项目：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“多卷本《中国报刊阅读史》”(16ZDA222)

盖学堂者,报馆之心腹也;报馆者,学堂之吭咽也。有学堂而无报馆,则诸学之径涂,仅能课诸学堂以内之人,必不能课诸学堂以外之人。是曰域其量也,是曰钥其门也。是涨力无出也,是吸力未广也。此非创立学堂之神旨也。有报馆而无学堂,则报章中之所报,仅能以报学外之事,必不能以报学中之口(事)。是犹川无源也,是犹口无本也,是犹人无筋络以贯通也,是犹物无杂质以化合也。此非开报馆之实效也,不过翻译西报供人玩观而已,于天下仍无裨也。故我二者须相辅而行,方能持久。有报馆以为学堂之康衢,则学堂必大;有学堂以为报馆之起址,则报馆必永。二者联为一气,而黄种不难长存矣。

……是故以学堂供报馆之目录,以报馆树学堂之风声。二者相须,如景随形,如声赴音,并驰联轡,敬业乐群。则以学翼教,以教辅政,神明之胄,庶有瘳乎。^[9]

在维新时期,报馆、学校、学会三者之间相互融通,以“合群”“乐群”为目的,共同促进新政、时政、西学的传播。梁启超指出,国群曰议院,商群曰公司,士群曰学会。而议院、公司其识论业艺罔不由学。故学会者,又二者之母也。学校振之于上,学会成之于下^[10]。学会是实现“合群”“乐群”的前提,是维新活动赖以实现的组织基础。尽管在维新时期各地成立了不少学会,但其与学校、报刊之间尚不成比例。故此,有评论认为:凡士农商贾,当各设学会,不成则官长劝之,殷富助之;成则上之大吏达之,朝廷以嘉其功以励其志。由是而不拘耕作艺术,皆跟风效法,自相濯磨,不及十年,当斐然可观。富强之效,如操左券矣^[11]。在论者看来,学会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公共组织,只有学会日渐发达,开民智、求富强方有基础。

因此,有组织的团体是推动报刊阅读的重要力量。一些开明官绅与学生结合在一起,他们以学会团结同志,以报刊抑扬舆论,以学校培育人才。有的学会自办报刊,如上海务农会办《农学报》、新学会办《新学报》、算学会办《算学报》、译书公会办《译书公会报》、蒙学会办《蒙学报》,广西圣学会办《广仁报》等等^[12]。报纸成为推动学会发展的重要力量,正如托克维尔所言,“报纸使他们结合起来,但为了使结合不散,他们继续需要报纸”^[13]。报纸成为连接学校、学会的重要纽带,在制造和传播舆论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《时务报》作为维新报刊之翘楚,引领着新式报刊的发展方向。正如蔡元培所言:“我国人思想之稚,观于言论、实事之间,已可概见。丁戊之际,有《时务报》,始欲以言论转移思想,扶掖弊习,有推陷廓清之功;其后有《知新报》,参以学理;有《湘学报》,参之以掌故。嗣是人心为之一变。”^[14]而维新时期的报刊阅读,也是在《时务报》的影响下,由通商大邑向边远地区逐步扩张。

在《时务报》的影响下,各地学会创办的报刊种类繁多,如时政类、科技类、文摘类、专业类报刊等等。各地学会因地制宜,有针对性创办适合自身特色的报刊,如蒙学会创办的《蒙学报》、务农会创办的《农学报》,译书公会创办的《译书公会报》、新学会创办的《新学报》,女学会创办的《女学报》,工商学会创办的《工商学报》,蜀学会创办的《蜀学报》,圣学会创办的《广仁报》等等。一些志趣相投的官绅,往往利用松散的组织和社会网络筹资办报,尽管许多报刊存在的时间很短,且影响不广,但是维新时期的报刊总数相当可观。除了一些通商口岸之外,湖南、江西、四川、贵州、广西等地也相继创办了一些报刊,地方性报刊的崛起,有利于报刊阅读的空间扩张和地域性阅读群体的发展。如蜀学会创办《蜀学报》之后,要求“省垣入会者,以阅报为首务”^[15]。开办三个月之后,该报便声称:“本馆自开报以来,逐渐推广,现在销售几及二千份,纸张务极坚洁,刊印格外精审,购者源源而来,仍有应接不暇之势。”^[16]

与《时务报》这样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大报相比,许多地方性报刊发行范围有限,但它对当地社会却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。曾出使欧洲的宋育仁对四川地方报刊价值的认识颇有代表意义,他对汪康年说:“蜀报诚不如《时务报》之美,但西南仅此发端,拟祈鼎力为助,以广边隅风气。可否贵报一律行蜀者,交《渝报》馆代售?在省寄省,则人皆一取两得。庶初开之铺,不为老招牌所压,俟盛行后再易新章,如蒙许可,即望赐覆为颂。”^[17]宋育仁认为,《时务报》固然很好,但是本地报刊的发展更需要扶持。因此,《渝报》在创办之际,便利用本地资源,号召当地官绅捐款,且将捐款和阅报结合在一起。其章程规定:

捐助百两以上者,每年送阅报五分;五十两以上者,每年送阅报三分;三十两者每年送阅报一分。均无报费。

各府州县各就其地,托一友人采访要件,按月函知,并托代为售报,不必加以访事名目,亦勿庸议给薪水,但按期送报一分,以搭酬劳。

阅报费先交银十两者,送报五年;先交洋银十元者,送报三年;先交银三两者,送报一年;先阅后交银者每年银三两六钱,闰月照加,折购者每册九分。

先阅后交者,本城送满一月,外境送满三月,皆须收费始行续送,以示限断。^[18]

章程将社会捐助、读者先期订阅与来稿予以特殊的优惠,将赠送报纸作为回馈社会的重要手段,从而能够推动该报在本地社会广为流布。这在地处偏远的重庆,具有一定的营销效果;对重庆读报风气的形成,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。另外,《岭学报》《广仁报》等维新报刊的章程中亦有类似规定,以广纳资金,推广阅读,扩大影响。

二、维新时期湖南的学会、学校与读报风气

维新时期,学会是团结士绅的重要组织,也是报刊赖以生存的凭藉之所。如《时务报》利用强学会的余款而设,表明了它与维新派有着直接的关联。全国各地学会将设立报刊作为其重要的工作内容,许多学会附设报刊,以鼓吹新政,提高学会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力。在维新思潮的影响下,湖南的南学会得到了陈宝箴、黄遵宪、徐仁铸等地方大员的鼎力支持,又有梁启超、谭嗣同、唐才常等维新人士的积极推动,加上延请湖南著名学者皮锡瑞任会长,湖南士风为之一变。1898年2月21日,南学会第一次正式开会,“官绅士民,集者三百余人,堂上设讲,座下排横桌,听讲者环坐焉……士大夫周旋问答,言笑晏晏”^[19]。南学会的主要活动,尤其是皮锡瑞、谭嗣同、黄遵宪、邹代钧等人的讲演,都在《湘报》刊布,而《湘学报》“系学会捐资创议,不收捐助之费”^[20]。作为附设于南学会的报纸,《湘学报》首先要确保会员能够及时阅读,这是“组织化传播”的重要特征。由于有具体的办报章程和较为充足的经费来源,《湘学报》可以完全按照南学会的意图办报,其发行也得益于南学会的推动。

作为南学会的主要支持者,湖南巡抚陈宝箴首先要求省内士绅和学堂学生广为阅读。《湘学报》甫一创办,他便饬令:兹《湘学新报》之设,悉本此议,且为湘中承学有得之言,于本省人士,启发尤为亲切。定章每月刊发三册……为此,札仰该县于奉到后,先自捐廉赴省订购,每次或数十册,或十余册,分交书院肄业各生及城乡向学子士,一体披阅。并劝绅富自行购买分送。俾乡寒峻,皆得通晓当世之务,以为他日建树之资。所费无多,为益甚大^[21]。而湖广总督张之洞则要求湖北全省书院生徒阅读《湘学报》,他认为《湘学报》“考核精详,确有实用……有关民生,均为方今切要。学术治术,自宜广为传布。除省城两湖书院发给五本,经心书院发给二本,本部堂衙门即抚学院司道荆州衙门各一本。由善后局付给报资……所属各州县,将以上两报一体购阅,《湘学报》并应发给书院诸生阅看”^[22]。可见,书院与学堂在报刊阅读中起着重要作用。晚清湖南书院、学堂较为发达,尤其是时务学堂创办之后,极为重视西学教育,其功课中西学以“各国文字为主,兼算学、格致、操演、步武、西史、天文、舆地之粗浅者”。要求学生“豫储远大之器,必使兼通中外”^[23]。时务学堂积极传播新学,参与维新运动。南学会成立后,每次举办演讲,都有大量时务学堂的学生前来听讲,并积极参与南学会的“问答”,探讨新学和时政热点,从而使学校与学会之间在教学、社会实践方面有着紧密的联系。南学会“会友”有三种方式:“议事会友”“讲会会友”“通信会友”^[24]。从而将有志于维新者通过广泛的交往途径结合起来,极大地推动了维新思想的组织化传播。这也是湖南维新报刊能够在本地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重要原因。

南学会的熊希龄等人为了“补《时务》、《知新》、《湘学》之不逮”^[25],于1898年3月7日创办了湖南近代第一家日报——《湘报》。熊希龄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说:“《湘报》风声全省皆知,望我出报甚切,乞速办就机器寄湘,别事尚可缓,此事务乞拨冗代办也。”^[26]熊希龄对《湘报》寄予厚望,希望该报“专以开风气,拓见闻为主”^[27]。正如后来文廷式在为《湘报汇编》作序时所言:

《湘报》者,创自长沙,起于戊戌。垣宿当躔之日,而明德作镇之年。俊侣联生,畸人朋出,联袂云合,楮墨斯腾。标题已确,是南国之良金;謄记遥传,应西人[江]之天马。英才既集,宏论方多,清议之风,斯为称盛!

……每诵斯文，至于雪涕。嗟乎！谁与独处，悲生雒浦之衾；岂其无人，泪堕山阳之笛？悼往者之不作，感来日之大难。故知落叶自陨，无假于疾风；相思不断，且同于春水。^[28]

《湘报》发行后，“无论官绅士商，均送报半月，不取报资，半月以后，有愿阅者，请知会送报人挂号注明姓名居址，以便按日送报”^[29]。不久，“各府风行，湖南热力因为之一动……视学堂、学会为尤捷”^[30]。读者张翼云读《湘报》之后，“呜咽声嘶，流涕被面”^[31]。《湘学报》《湘报》在湖南各地的流传，对维新思潮的“地域化”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。谭嗣同不无自豪地宣称：“湘中风气果开，自《湘学》出报，读者咸仰湘才若在天上矣。”^[32]在谭嗣同看来，《湘学报》已成为湖南维新运动的象征，展示了湖南维新人士的学养和风格。

谭嗣同在《〈湘报〉后叙》中指出：“夫言新于今日，其惟吾湘乎？”湖南维新运动的广泛开展，得益于开明官员和地方士绅的推动，谭嗣同便认为：“假民自新之权以新吾民者，厥有三要，一曰：创学堂，改书院……二曰：学会……三曰：报纸”，而报纸可以跨越时空，使“不得观者观，不得听者听”^[33]。《湘学报》与《湘报》出版3个月后就发行至6000份，并很快在湖南各地广为传阅。以长沙为例，“销《湘学报》前数百分，销《时务报》又千余分。”而当时的南京“销《时务报》仅及二百分”。所以，谭嗣同感叹道：“盖风气之通塞，文化之启闭，其差数亦如此矣。”^[34]

报纸销量是检视社会开放程度的重要标志。湖南在维新之前，鲜有报纸发行，而《湘学报》与《湘报》立足于湖南市场，注重以新学启发本地士子，两份报纸对本地新学动态也颇为关注。尤其是《湘报》出版之后，对南学会和湖南学界、政界的报道较为深入，如南学会演讲、南学会问答，以及湖南各地学会、学堂的动态等等，记载颇详。又如时务学堂入学考试试题，各班学生名单等详细情况，以及时务学堂学生参加南学会问答的活动，《湘报》都加以刊登，可见该报对这所湖南维新时期“样板”学校的关注。而时务学堂的学生也是该报的重要读者和撰稿群体，据统计，时务学堂有10名学生在《湘报》上发表了17篇重要文章，这在当时的维新报刊中是极为罕见的现象。时务学堂的学生与南学会、《湘学报》《湘报》保持的密切关系，说明了进步学生已崛起成为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，在接受新学、传播新知方面已走在社会的前列。

《湘报》不但为湖南官绅与学生所关注，它还广泛联系社会各界人士。其章程第五条规定：

本馆拟广求博学通达者，立为报友，造册注明姓名籍贯居址，按日送报，不取报资。如以所著论议及访求确实新闻新事函知本馆，酌核照登者，每届年终计算所寄之文多寡，准予本报余利项下抽提两成作为花红，分寄各报友以为酬劳之资。^[27]

值得关注的是，在《湘报》之前，很少有报刊将读者称之为“报友”，“报友”意味着办报人与读者之间存在情谊，而非冰冷的买卖关系，这显然将读者的定位为“报纸共同体”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并希望“博学通达”的报友为报纸的发展充分贡献才智。《湘报》注意发表读者的稿件，根据读者发稿情况给予回报。如衡南人杨则在《湘报》第14期上发表了《论阅报之有益》一文，第48期的“报友题名”中，便列出了杨、熊崇熙、易鼐、刘颂虞、罗棠、毕永年、洪文治等12人为报友，并为他们免费送报一年。这一方面提高了“报友”的知名度，另一方面又激励读者投稿，从而使一些默默无闻的读者能获取经济报酬与社会声望。一些时务学堂的学生正是通过投稿而与《湘报》与南学会建立广泛联系，实现了“学生议政”的梦想。

为了进一步扩大报纸的资讯来源，《湘报》还注重发挥送报人收集和采写新闻的作用，在章程中制定了一系列奖惩措施：

送报人遇有本城新闻新事，探听确实者，立即报知本馆主笔处核定。可否照登，由主笔转告账房，给一凭条，注明某人所报之事，量其难易，分别一二三等，归月底结算，发给赏号。如有诬报，希图奖赏者，除扣赏外，罚钱三倍。^[35]

不仅如此，针对湖南地处偏远、各地购阅报纸较为困难的现状，《湘报》力求使其发行延伸至偏远乡村，为下层民众提供精神食量。其章程第九条规定：

本报与学堂、学会联为一气。凡各府州县穷乡僻壤不能购报者,应请各府州县分学会会友查明市镇村落,总汇地名,函知本馆酌计每处捐报数分,由省城总学会设法寄至各府州县分学会会友,转交居乡会友,择地张贴墙壁。如官府告示及劝善格言之法,俾众一览咸知,以示同仁之道。^[27]

这一规定进一步表明了《湘报》与南学会的依存关系,南学会作为湖南维新时期地方团体,具有明显的“公共性”。对于南学会的性质,梁启超认为它“尤为全省新政的命脉,虽名为学会,实兼地方议会之规模”。其目的是要“激发保教爱国之热心,养成地方自治之气力”^[36]。为了推动《湘报》阅读的地方化,南学会利用了其在全省各地分会的优势,将《湘报》在偏远乡村发行作为分会会员的重要职责,并通过在乡村“贴报”的方式,确保乡村民众能够广泛地阅读《湘报》,显然,《湘报》推出这一重大的“惠民”举措,打破了传统的精英读报方式,使那些地处偏远的民众能够“去塞求通”,这在当时的维新报刊中是难得一见的^[37]。

李抱一评价《湘报》在当时的影响:“在世虽数月,而声光灿然,言湘政者莫不稽焉。”^[38]欧榘甲也对《湘报》给予极高的评价,他指出:昔者谭烈士嗣同,唐烈士才常,开《湘报》于长沙,日日发论湖南之当自立,如萨摩长门之于日本,慷慨激昂,全湘风动。湘人以军功闻天下,号强悍,至是知外事,知爱国,有国家思想焉。是为中国省报言自立者之始^[39]。1898年9月16日创办的《菁华报》在章程中称“陈右帅所设《湘报》,极为雅驯”^[40]。尽管《湘报》仅发行数月,但它已深入到湖南民间社会,对维新时期湖南新学的传播起着重要作用。

三、湖南的学会、书院与公共读报活动

南学会以讲学、集会、研讨、阅读为重要内容,甫一创设,就对公共阅读问题十分关注。专门“设藏书楼一区,广度图书”^[41]。《南学会申订章程》明确规定:本学会所藏书籍,准人领取阅书凭单,入内浏览……自本月十五日起,愿阅报者,照单领凭择观。其时,南学会订有26种报刊,共计89份,所订各报及份数见表1:

这份名单基本上囊括了当时全国发行的主要报刊。南学会根据报刊的性质决定所订报刊的数量,如维新报刊《时务报》《知新报》《湘报》《湘学报》等各备10份,《申报》《沪报》等商业性报纸则仅备一份。由此可见,南学会所开辟的阅览室,将订阅的国内外主要中文报刊作为公共读物提供给公众阅读,这与单个读者的私人阅读有着很大差异。读者来到南学会的阅览室,需要办理借阅手续方可入内,并需要遵守阅读规则,由于有许多读者的“在场”,读报纸就具有共同的场域感,读者在读报的时分,可以感受到公共阅读的诸多好处,如读者通过阅读不同种类的报纸,对各报的内容与形态有着直观的比较和借鉴,不同的思想与观念随着报纸的“流动”而不断变化。对于平时难有机会接触报纸的读者而言,阅览室打开了通往外部世界的窗口,而那些经常来阅览室读报的读者,每次读报的时分又成为一种仪式,读报纸成为一种精神享受和文化信仰,报纸的“公共展示”为阅读的集体化、规范化、仪式化创造了条件。而此前,虽然强学会也有公共集会活动,却很少将大众报刊提供给公众阅览。从这个层面上看,南学会开创了近代报刊公共阅读的新空间,它进一步融合了读者、学会与报刊的关系。一些读者在读报之后,又能有机会参与南学会的讲演和问答,他们在报纸上获得的知识和产生的疑问,通过学会的公共集会得以传播和解答,从而使“公共阅读”转向于“公共讨论”。尽管我们难以统计当时读者的具体数量,但是,这批早期进入公共阅览室的读者,无疑对“博览群报”有着切身的感受,而由于读报所形成的“阅读文化圈”又能进一步开阅读者的视野,读者从个人空间走向公共空间,使读报的意义有着极大的改变。

由于时务报刊“议论切要,采择谨严”,以议论时局、促进维新为目的,显然有别于一般报纸的新闻报道。开明官员将时务报刊视为考察时务、学习新学、开发民智的“书”,一方面要求学子认真精读,体悟其意。另一方面又表明它不属于传统的书,它的内容涉及“一切舟车制造之源流,兵农工商之政要”^[43]。当时湖南一些书院制定的轮流阅读制度,将报刊视为知识读物而具有普及教育的功能,如当时著名的岳麓书院就规定:“购时务报六分,每二斋共阅一分,由管书斋随时派人分送,每斋自第一号起,尽一日之力,或翻阅抄誉,或略观大意,各从其便。次日递交第二号,以次至末,再递交第二斋第一号,复以次阅毕……仍缴归管书斋长收存,备来岁住院士子依次领阅之用。”岳麓书院等书院的“阅报章程”表明,当时在学生斋舍推广的“轮流读报”制度,规范

了学生读报的程序和进度,极大地提高了报纸的阅读效率,而学生读报与评报的结合,进一步提高了报纸阅读的深度和广度,学生在宿舍或者教室对报纸内容所进行的讨论,具有“公共领域”的性质。在这个具有相对自由的话语空间,学生之间的交流对新思想的认知会得到极大的提高。维新时期,湖南时务学堂的一些学生在《湘报》发表评论,表明他们已经将报纸视为延伸自己思想的载体,读报与投稿的结合,是知识接受与传播的互动,报纸作为“知识纸”“思想纸”的作用进一步彰显。

可见,书院订阅报刊,目的是让所有学生都有机会读报。一份报纸到达某所书院,就成为公共读物,所有学生都必须按照院方的要求,轮流观阅。看报是一项学习任务,报刊“为目前不可不看之书”。报刊被视为与书籍有同等意义的知识资源,书院师生通过阅读报刊,可以“开广见闻,启发志意”^[44]。因此,有识之士将《时务报》《湘学报》《湘报》视为必读之“书”,以区别于当时的商业报刊。读书人读“时务书”,便意味着通过时务报刊接触到新学,从而在知识体系上区别于“旧学”。

四、维新时期湖南报刊在士林中的影响

由于《湘学报》分门别类,“将群章甫缝掖之儒,讲求中西有用之学,争自濯磨。以图富强,以存遗种”^[45]。从而声名鹊起,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。著名学者谭献在读完《湘学报》第一册之后,便认为该报“以史学、掌故学、舆地学、算学、商学、交涉学为六条目,序例标揭,意言平实,非《时务报》矫徇鄙倍之比”^[46]。谭献此说虽值得商榷,但在一定层面反映了《湘学报》的确很有特色。同时,《湘学报》也在省外广为发行,如在京城任文渊阁校理的王同愈,于丁酉年(1897年)七月初六日,“阅建霞所创《湘学新报》三卷”^[47]。说明其在北京已有发行管道。

《湘报》《湘学报》通过各种途径传播,影响不断扩大。湖南名儒王闿运曾数次阅读《湘报》,他在1898年6月25日的日记中记道:看《湘报》一月,有一分府官,正黄公度同里人,云保卫不成,臬请开缺,抚台慰留;抚亦被劾,朝廷慰留,爱惜人才如此^[48]。平时少有读报记录的王闿运,特地表明他已看了一个月的《湘报》,这对潜心于经学的他而言,已颇为不易。又如江西义宁的仁义书院,虽然是一所乡人捐资的乡村书院,但对新式报刊的价值却有深刻的认知。认为:《湘学新报》分史学、掌故、舆地、算学、商学、交涉六门,贯穿古今中外,讲求实用,每年末又附各门切要书目提要二页,指示门径,诚最便学者之书^[49]。而柏文蔚在维新时期组织邑人成立“阅书报社”,他虽然居住在安徽寿县的乡下,却有机会读到《湘学报》。他回忆道:梁启超在湖南创立“南学会”,出版之《湘报》,印刷亦同《申报》,吾人皆视为金科玉律^[50]。其时,中国的乡村社会很少有报刊出现,而在1896年高中秀才的柏文蔚,对“洋务”已有所了解,并通过在家乡创建“书报社”,以广见闻,《湘学报》能传入安徽偏僻的乡下,对柏文蔚思想观念的影响是无容置疑的。

值得注意的是,许多《时务报》的读者也通过各种途径阅读《湘学报》。如杭州的藏书家邵章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提及:“《湘学报》适在友人处见之,极佳。请寄五分”^[51],不久,他便询问:“《湘学报》到否?能否寄下五十分”,之后,他又在信中回应:“连日收到《湘学报》三十分,一到即行分罄,尚有索者。望再寄我二十分,至要”。可见当地读者对该报的阅读兴趣较高,作为经销商,他自然要求汪康年“请再寄二十分,勿延”^[52]。而经常阅读《时务报》的丘宪、陈庆年、高凤谦等人也订阅《湘学报》,丘宪特地来信告知汪康年:“《湘学报》乞仍代寄罗子敬处为祈”^[53]。陈庆年则“订《湘学报》一年,值钱八百八十文”^[54]。张元济还将订阅的《湘学报》,供“馆中同学所公阅也”^[55]。缪荃孙虽然代理《时务报》等报刊的发行,但却很难有机会在南京购阅《湘学报》,但由于与谭嗣同的私交甚厚,有机会向他借阅。1897年5月31日,他“读《湘学新报》,即还谭复生”^[56]。同样,《湘报》也广受读者欢迎。长期代理《时务报》发行的费麟生,曾转告汪康年,“可否乞代转告《湘报》分局,请其先寄十分或廿分至敝处,自十六册起至现在所出之册止。半月以后如悉售去,即可迳告分局添寄。如销数不满十分,仍将原报带呈分局”^[57]。读者作桀则写信给汪康年说:“初九接《湘报》第九册,廿一又接《湘报》第十、十一两册,惟中无函字,想见执事贤劳,管城子亦疲于奔命也。”另外,他还要求,“务请转函湘局,自第一至第八册补齐寄下”^[58]。可见,通过《时务报》的销售网络,《湘学报》《湘报》对外省读者也产生了一定影响。

五、结语

与甲午之前宗教报刊的说服式传播不一样,维新时期报刊传媒的组织化传播特色较为明显。维新报刊大多依赖于学会,而学会与学堂、书院又紧密结合,因此,维新报刊以社会组织为依托,利用各类社团广泛的文化和经济资本进行运作。维新报刊的发行,更是依赖了各类学会、学堂的公共资源,并通过各种人脉关系将发行网络延伸到边远地区,使一般读书人有机会接受维新思想的洗礼,这显然是之前宗教报刊无法做到的。因此,甲午之后,中国社会的启蒙,得益于维新刊物的广泛传播和阅读。

维新时期的地方性学会,是知识精英重塑主体性意识的重要标志。许多开明官绅的加入,又使一些舆论领袖找到了推广新思潮的舞台。学会办报首先保证了会员的阅读率,各地的学会利用报纸表达立场、弘扬学术、传播新知、团结同志,使维新报刊具有社会整合的作用。对读书人而言,加入学会不仅可以找到归属感,而且能够在组织中获得许多学习和交流的机会。尽管我们无法统计有多少学会成员在读报纸,但学会对会员读报的关注是毋庸置疑的。南学会开辟的书报阅览室,就表明它已经非常注重报刊的普及,并较早地创造出“公共读报空间”,读者在阅览室读报,具有“集体在场”的体验,读报纸不仅是获得新闻和知识,而且因“集体阅读”更具有仪式感。

与甲午以前中文报刊的阅读主要集中于少数官员与口岸文人不同,维新报刊通过它较为多元的发行系统渗透到州县以后,报刊阅读便从通商口岸延伸到城镇。而读者群体也由“都市之人”扩展到“城镇之人”,尽管上海、广州、天津这样的通商口岸仍然是报纸发行的重要区域,且是报纸读者较为集中的地方。但是,一些交通较为便利的中小城市,也会有新式报刊的传布,尤其是得风气之先的湖南,由于南学会大力鼓吹维新变法,大力创办报刊并推动发行,加上地方大员推行的“官费订报”活动,通过官府、书院和学堂进一步将报纸推广到县城之类的“镇”,对于这些中小城镇而言,报刊作为新式传媒开拓了舆论与文化空间,报刊将“城镇之人”与外部世界连接起来,除了足不出户而知天下事之外,维新时政与西学知识冲击了他们的思维方式,进而在“传统”与“现代性”之间彷徨与选择。正是由于维新思潮的深刻影响,在湖南一些报刊传播较为活跃的地区,出现了“士绅社会”向“知识人社会”的过渡,一些开明的读书人通过报纸感知到社会思潮的脉动,从而逐步改变他们的阅读方式与思维模式。一些熟读经典的传统士人,在看到维新报刊之后,对“圣贤之书”产生了怀疑,在时局危殆的阅读背景下,他们的阅读趣味开始从“古典”走向“现代”,这体现出现代报刊传媒作为“思想纸”对读书人所产生的深刻影响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亨利·列斐伏尔.空间: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[M]//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读本:第3卷.王志弘,译.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8:24.
- [2]Relph E.Place and Blamelessness[M].London: Pion, 1976: 25-30.
- [3]曼纽尔·卡斯特.网络社会的崛起[M].夏铸九,王志弘,等译.北京: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2006:394.
- [4]克利福德·吉尔兹.地方性知识[M].王海龙,等译.北京:中央编译出版社,2004:273,19.
- [5]李仁渊.晚清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: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[M].台北:稻乡出版社,2005:141,145.
- [6]方汉奇.中国新闻事业通史:第1卷[M].北京: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1992:364.
- [7]宋恕.自强报公启[M]//宋恕集.北京:中华书局,1993:260.
- [8]丁文江,赵丰田.梁启超年谱长编[M].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1983:68.
- [9]论学堂报馆须相辅而行[N].国闻报,1899-2-3.

-
- [10]梁启超. 论学校十三(变法通议三之十三)学会[J]. 时务报第 10 册, 1897-10-26.
- [11]设学会以端国本说[N]. 汇报第 53 号, 1899-2-25.
- [12]汤志钧. 戊戌时期的学会和报刊[M]. 台北:台湾商务印书馆, 1993:前言 2.
- [13]托克维尔. 论美国的民主:下卷[M]. 董果良, 译. 北京:商务印书馆, 1989:699.
- [14]蔡元培. 创办外交报叙例[M]//蔡元培全集:第一卷. 北京:中华书局, 1984:137.
- [15]蜀学会章程[J]. 蜀学报第 1 册, 1898-4-5.
- [16]本馆告白[J]. 蜀学报第 9 册, 1898-7-3.
- [17]宋育仁. 宋育仁函(一)[M]//汪康年师友书札(第 1 册)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6:543.
- [18]渝报章程十五条[J]. 渝报第 1 册, 1897-11.
- [19]开讲盛仪[N]. 湘报第 1 号, 1898-3-7.
- [20]湘学报第 11 册[J]. 1897-12-14.
- [21]陈宝箴. 湖南抚院陈飭各州县订购湘学新报札[J]. 湘学报第 5 册, 1897-5-31.
- [22]张之洞. 两湖督院张咨会湘学院通飭湖北各道府州县购阅湘学报公牒[J]. 湘学报第 15 册, 1897-9-7.
- [23]湘抚陈招考新设时务学堂学生示[J]. 时务报第 43 册, 1897-10-26.
- [24]南学会总会章程[N]. 湘报第 35 号, 1898-4-15.
- [25]湘报叙[N]. 湘报第 1 号, 1898-3-7.
- [26]熊希龄. 熊希龄集(第 1 册)[M]. 长沙:湖南人民出版社, 2008:74.
- [27]湘报馆章程[N]. 湘报第 27 号, 1898-4-6.
- [28]汪叔子. 文廷式集(上册)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 1993:152.
- [29]本报告白[N]. 湘报第 1 号. 1898-3-7.
- [30]衡州士绅开设俚语报馆禀并批[N]. 湘报第 141 号. 1898-8-30.
- [31]张翼云. 书唐才常时文流毒中国论后[N]. 湘报第 95 号, 1898-6-26.

-
- [32]蔡尚思, 方行. 谭嗣同全集(下册)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1: 472.
- [33]湘报后叙下[J]. 湘报第 11 号, 1898-3-18.
- [34]蔡尚思, 方行. 谭嗣同全集(上册)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1: 262.
- [35]湘报馆章程(续登) [N]. 湘报第 28 号, 1898-4-7.
- [36]梁启超. 南学会叙[J]. 湘学报第 25 册, 1898-12-14.
- [37]李孝悌. 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[M]. 石家庄: 河北教育出版社, 2001: 17.
- [38]李抱一. 长沙报纸史略[M]//近代史资料文库: 第 9 卷. 上海: 上海书店出版社, 2009: 247.
- [39]天平洋客. 新广东[M]//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: 第 1 卷(上册). 北京: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 1960: 288.
- [40]本馆刊报章程[J]. 菁华报第 1 册, 1898-9-16.
- [41]湘学开会记[N]. 国闻报, 1898-6-2.
- [42]南学会申订章程[N]. 湘报第 75 号, 1898-6-1.
- [43]廖寿丰. 浙抚廖分派各府县时务报札[N]. 时务报第 18 册, 1897-2-22.
- [44]王先谦. 岳麓院长王益吾祭酒购时务报发给诸生公阅手谕[J]. 时务报第 18 册, 1897-2-22.
- [45]湘学新报例言[J]. 湘学报第 1 册, 1897-4-22.
- [46]谭献. 谭献日记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13: 325.
- [47]王同愈. 栩缘日记卷一[M]//王同愈集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98: 250.
- [48]王闿运. 湘绮楼日记(第 4 册) [M]. 长沙: 岳麓书社, 1997: 2154.
- [49]江西义宁县仁义书院变通冬课诗赋改为策论启[J]. 知新报第 48 册, 1898-4-12.
- [50]柏文蔚. 柏文蔚自述[M]. 北京: 人民日报出版社, 2011: 8.
- [51]邵章. 邵章函(二) [M]//汪康年师友书札(第 2 册)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6: 1220.
- [52]邵章. 邵章函(七) [M]//汪康年师友书札(第 2 册)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6: 1222.
- [53]丘宪. 丘宪函[M]//汪康年师友书札(第 1 册)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6: 199.

[54]陈庆年. 横山乡人日记[M]//近代史资料文库:第1卷. 上海:上海书店出版社, 2009:241.

[55]张元济. 张元济函(十九)[M]//汪康年师友书札(第2册)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6:170.

[56]张廷银, 朱玉麒. 缪荃孙全集·日记(第1册)[M]. 南京:凤凰出版社, 2014:465.

[57]费麟生. 费麟生函[M]//汪康年师友书札(第4册)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9:3481.

[58]作桀. 作桀函(六)[M]//汪康年师友书札(第4册)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9:3695.